

# 先生犹是老孩提

# 怅望海水变蓝处

韩浩月

画面里，几个人在麦地里割麦子，用最古老的方式——手持镰刀。天空半晴半阴，时而有闷雷的声音滚动，这成功唤起了我内心的某种焦虑。对于有过农耕经验的人来说，收获季节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麦穗熟透时，大雨降至。一场大雨在天空“监工”，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劈头盖脸地落下，而无论你怎么赶活，麦子总得一镰一镰地割，每次抬起酸痛的腰，看见前面仍然是漫无边际的麦田。

这是贾樟柯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一幕。画面切换，之后是大型收割机在麦地横冲直撞，破碎的麦秆伴随着扬尘，收割机后面仿佛坠着一条“彗星尾巴”。在影片拍摄的2019年，在小麦的主产地河南、山东等地，像电影里那样大片的麦田，已经很少有人用镰刀收割了。割麦，已经是性价比最低的劳动方式。

不排除贾樟柯“邀请”了几位当地村民，在麦田里“表演”割麦。只有如此，“轰隆隆”驶过的收割机，才有了更强的对比与象征意义。这个庞然大物碾碎了麦田表层的一切，让收割者弯下腰的姿态变得无比渺小。粮食被自动装置于容器当中，废弃的秸秆被归还于大地，虽然这一幕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但依然会用崇拜的眼神目睹这一切的发生，那是骨子里上千年农耕经验被碾碎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反应。

割麦者是电影里少有的几位没有享受到特写待遇的人。在整部电影里，出现了太多张面孔。他们是山西人、陕西人、河南人，他们出入或静止于村庄里、戏台下、街道上、车站中。贾樟柯的镜头在他们的脸上体现出一种“平均主义”，镜头里的面孔放大呈现在大银幕上，离观众特别近，面孔里的皱纹沟壑，特别清晰。看到这些面孔，你会清晰地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哦，这就是中国面孔”。他们的脸上，所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当代，也有诸多历史与文化的碎片，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独特的表情。这表情容易让人想起父辈、想起童年，还有过去那不曾化解的一切。

贾樟柯用这部电影化解了什么？从在一个普通的村庄——贾家庄办一个“文学季”，到执着地想要拍摄一部名叫《一个村庄的文学》（《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原名）的纪录片，贾樟柯是要对自己青春时期的文学情结做一个了结吧。在电影里，除了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等四位出现最多的作家外，欧阳江河、西川、苏童等大量诗人、作家，也被以字幕提示的方式，着重介绍给观众。

这是一场属于贾樟柯的“盛宴”，他是坐在宴席上“主陪”位置的举杯者。这也是一场文学中青年的精神聚会，只是他们默默地关注、默默地走进影院，看完之后一言不发。两天两百多万元的票房数字，也默默地在这“文学”与“娱乐”之间，画上了一道分水岭。

不少给《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打了较高分数的观众，给出的理由是，余华出场的那段太好笑了，他可真像个脱口秀选手；梁鸿出场的那段太好笑了，好几次让人喉咙发紧想要落泪。这不是贾樟柯电影的正确答案，电影的灵魂在于文化表达，还有催泪弹齐发，正是国产片创造票房神话的两大利器，拿《夏洛特烦恼》和《你好，李焕英》来对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种错位感，很别扭。贾樟柯拍这部电影，恐怕不是想让观众哭或者哭的——这也一向不是他的创作理想。可是，如何让观众从黄沙翻涌一片浑浊的海边游到空旷、透明、湛蓝的海水深处？这道难题，就算是贾樟柯也没法给出解决方案。

贾樟柯作品一直有“作者电影”的标签，这次他拍摄的主角又是作家，再加上电影的故乡题材，《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一次集齐了如此众多文艺中青年关心的要素。或是为了稀释一下电影的艺术浓度，贾樟柯找了一些村民面对镜头来朗诵诗句，但这种陌生性格恰又成为影片最文艺的组成部分。朗读者姿势与声音的生疏与生硬，也成了影片最为生猛的地方。对比之下，观众也希望看到影片的其他内容，给人更多以“路人”之感，但影片整体分明是柔和的，是缓慢而平静的，电影以“海”之名，拍摄了一部蜿蜒绵亘、含蓄清淡的故事。

梁鸿的儿子王亦梁坐在母亲村庄的河边介绍自己的那一幕，成为影片最具意味的场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使用河南话来介绍自己，这个时候梁鸿入画，一字一句地教儿子用河南话讲自己的名字、兴趣爱好、就读的学校，等等。在那一刻，从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那里一直被延续下来的故乡观念，仿佛有了续接的可能性，这让人欣慰地一笑，但此后也会立即知道，在年轻这一代中间，故乡已远，故乡可能只是一个旅行目的地，而不再是家园。

贾樟柯的电影是为了自己而拍，也是为了一群已届中年的同龄人而拍，电影没有对青春的缅怀，只有中年心境下的凝视与怅望。余华“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那段叙述，或是因为需要呼应片名的缘故，被剪辑到了最后，这段话结束，影片也戛然而止。电影有诸多未尽之意，用这样的方式结尾，让未尽之意翻倍，这是种创作技巧，也是对缺憾的一种解释吧。



汪曾祺画作《槐实苦涩》。（作者供图）

一篇短文，到此戛然而止。却感觉蛰伏着千钧之力！

汪老逝世前的一年，我曾介绍外省电视台的一位学生去拍关于汪老的纪录片。当时我正应邀在北京撰稿，忙过白天，晚饭后去见学生。才知她们在汪老家拍了一整天，汪老不仅亲手给做了一桌饭菜，还画了四张画，给她们每人一张。她们未必都知晓汪曾祺的名声，几张画四处散放。我佯称全拿走，她们才赶紧收起。听我讲起这件旧事，张闻笑道，汪老是很随和的一个人，当年你也是可以问他要画的。面对寂静展厅里汪老琳琅而淡雅的画作，恍然觉得他的音容如此切近。他有一首诗题《紫藤》：“紫云拂地影参差，何处莺声时一啼。弹指七十年间事，先生犹是老孩提。”

“先生犹是老孩提”——观画赏文，这恰是汪曾祺的自画像。

《泰山很大》（《泰山片石》），堪称性情与创作关联的自诉状：

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就不会去写日出。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十年间两登泰山，但彼此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合一，使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

汪老的书画内容与他的短篇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以往我看过的画展，右下标注，仅仅是标题、作者、尺寸及种类。汪老的书画展与众不同，除以上标注，更有从他小说或散文中抽出来的片段。譬如一幅老树新枝图，题曰《七十七年前此刻，我正在生出来》。右下的文章摘录（源自《旅食与文化》题记）：

舍伍德·安德生的《小城畸人》记一老作家，“他的躯体是老了，不再有多大用处了，但他身体内有些东西却是全然年轻的”。我希望我能像这位老作家，童心常绿。我还写一点东西，还能陆陆续续地写更多的东西。这本《旅食与文化》会逐年加进一点东西。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他写这篇题记是在1997年2月20日。5月16日，不到三个月之后，汪老溘然长逝。睹画思人，品咂再三，低回不已。

前面说到，汪老的画作无论花鸟猫鼠，还是时令蔬鲜，都归不到大题材之内。他的作品瞄准的也是人心、人情和人性之常。有人将他归于悠闲文学一类里，且认为他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对此他很不认同，在《老年的爱憎》一文里有很强劲的反对：

我写的反过一些谈风俗，记食物，写草木虫鱼的文章，说是“悠闲”，并不冤枉。但我也写过一些并不悠闲的作品。我写的《陈小手》，是很沉痛的……

中国人有一种哲学，叫做“忍”。我小时候听过“百忍堂”张家的故事，就非常讨厌。现在一些名胜古迹卖碑帖的文物商店卖的书法拓本最多的一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二是一个大字：“忍”。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人生哲学。

周作人很欣赏杜牧的一句诗：“忍过事堪喜”，以为这不像杜牧说的话。杜牧是凡事都忍么？请看《阿房宫赋》：“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

来冠名奖励对社区治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网格“二十大最美”、仙林“最美的人”、网格“特别贡献单位”……8年来，6730名党员群众、876个驻区单位获得奖励，评选出来的保洁员、保安、绿化员、工地工人、外国友人等，走上舞台中央披上荣誉绶带，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遇到什么事情，在党组织主持下，各方商量着来，矛盾就能迎刃而解。”仙林街道建立协商共治机制，通过走访服务、八方议事、物业星级评比等载体，让业主、物业、开发商坐在一条板凳上，引导他们有事商量着办，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在矛盾调处、环境整治、文明创建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让仙林的每一个居民都尝到甜头。

2016年11月，孙金娣提出整治仙林新村地下室的想法，遭到一片反对，大家都说“这是个马蜂窝，碰不得”。原来，1998年仙林新村拆迁安置时，本用于停放自行车的地下空间被786户居民抢占一空，私搭乱建成了1056个大小不等的隔间。没有抢到地下室的居民心有怨气，邻里纠纷不断。占到地下室的居民，有的用来堆放废旧杂物，有的摆着汽油罐和轮胎，有近两百户居民把隔间租出去住人，甚至有的开设钟点房、麻将馆、棋牌室，私搭电线、煤气罐烧饭屡见不鲜。

“这个马蜂窝不得不捅，不能等到出事再后悔，就是‘滚钉板’也要啃掉这个‘硬骨头’。”孙金娣说干就干，在与班子统一思想后，街道组建起6个工作组，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有的家庭，光有记录的上门就有三四十次。

居民倪安麟占据地下室开了家棋牌室，“街道、社区天天上门，街道领导三天两头找我，问我有什么困难。”他说，就算石头也要感化了，必须搬！不仅搬，他还主动做起了其他居民的工作。

10个月后，没有一分钱补偿，没有一起上访，仙林新村地下室整治完毕。街道把地下室全部粉刷一遍，用栅栏重新分割，分配每家都有一间，只用于摆放杂物。

街道趁热打铁，在仙林新村推出“本月我站岗”活动，对社区不文明等行为进行纠正，每家每户站岗一个月，好的楼栋就挂上“最美楼栋”“最美单元”。如今，这个昔日大家急于逃离的“脏乱差”小区，一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示范小区、样板小区。

2018年，仙林街道开展水环境治理，对辖区12条河道、352个出水排口全面排查整治。街道网格化把大伙联成一体，所有驻区单位共同参与，历时两年彻底消除了劣V类水质。如今漫步仙林大学城，两年前的“黑臭河”摇身一变成了新十里长沟，如同一条绿带串起各高校校区，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

今年2月，仙林街道又启动餐饮油烟整治，对105条商业街区、40个小区、临街商铺1636家餐饮店的1158个油烟排口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目前，433个问题排口已全部整改到位。

## 党旗高高飘扬，擦亮基层治理的鲜红底色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仙林街道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基层治理中担重任、打硬仗，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心骨”。

南翔

南国的中秋，依然暑气逼人。我邀了几位有闲的老友赶去深圳福田美术馆，观赏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展，事先约好的画家张闻馆长几乎同时到了展厅二楼。这个地处梅林的区美术馆，还是原来冠名雅昌艺术馆之时来过，一晃，好些年过去了。

之所以在开展不久就赶过来看画，乃因汪老在世时，我与他有数面之缘。

最早是1989年11月在合肥召开的《清明》创刊10周年活动上得见汪老，那时他的短篇小说已颇为风靡，如《受戒》《大淦记事》《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当年我看到一位评论家谈论他的《陈小手》，认为民国年间，民间的男产科医生陈小手“活人多矣”，最后却死在这个“活人多矣”的手艺——接生上，这才是小说最沉痛的地方。我问汪老这不是他最满意的一种评论？他笑而未答。悬想作家写出一篇蜂议四起的作品，任凭读者与评者的恣意发掘，本人保持一种缄默的姿态或是最佳；如果下一定论，无疑将堵塞作品蓬勃勃发的生机。犹记得，那会儿我十分迷恋一位海外华人作家的短篇小说，可这位作家仅有的一部长篇我却未读下去。遂问汪老，以你写短篇的手法写长篇行吗？他断然道，我到现在连中篇都没写过，林斤澜还写过中篇的。那次活动两位老作家住一个房间，平时交往亦多，以至于几年后我去北京打汪老家的电话，却是林斤澜接的——汪老错把林家的电话给了我。

活动结束后，汪老返京，很快给我寄来两本签名本，一本是《汪曾祺自选集》，另一本是《蒲桥集》。这本1987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虽已泛黄，仍在我的案头；另一本《蒲桥集》被学生借去，杳然不知所终。

因不是公休日，美术馆偌大的一个折角连房展厅，观者并不多。此次共展出了130多幅汪曾祺的书画作品，画作远多于书法。年轻帅气的张闻告诉我，这大概是汪曾祺书画作品最多的一次异地展示了。小幅、纸本水墨、36厘米左右见方的作品居多；也有一些小长轴，高不过70多厘米。汪老笔下，花果喜菊、喜荷、喜石榴、喜葡萄、喜紫藤；动物则爱猫、爱鸟、爱松鼠；时令蔬鲜则苦瓜、莴苣、莲藕、大葱、鳊鱼。逸笔率性，不拘成法，其趣味自现。张闻说得好，汪老的画，不在于他的技法如何，而在于其笔墨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文人趣味。

面对汪老林林总总的小幅画作，我想起一个作家写作的成功得失，颇相关是否有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即自己能够驾驭什么样的文体或题材，须得有自知之明。作家如此，画家亦然，画高山大川还是小桥流水，城郭市井还是花鸟虫鱼，盖在于性情——委婉谦抑，还是豪迈铿锵。汪老有一篇

（上接1版）

## 推行一线工作法，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

一天清晨，社区工作人员吴礼潇像往常一样到社区巡查，发现路上有一处鼓包，立即上报情况。城管部门来一看，不得了，路下方就是煤气管线！消防、燃气部门随后赶到，经过两个小时的紧急抢修，排除了险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有一星火光后果将不堪设想。”街坊们谈到这件事仍心有余悸。

城市社区居民诉求多、矛盾风险多，“等上门”不够，必须“登上门”。仙林街道在完善网格化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行一线工作法，街道社区干部全部下沉到网格中，实现“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难在网中解，情在网中结”。

“党员干部沉下去，矛盾问题才能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民声民情才能浮上来。”先后干过两个社区书记的郝智慧深有体会。

郝智慧2010年起担任街道仙鹤社区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大走访，这也是仙林街道常态开展的活动——进万家门、访万家情、送万家暖、连万家心。郝智慧拿出了厚厚一摞的笔记本，“足足花了大半年，才把3000多户跑完，记下了这60多本笔记，家家户户的基本情况、问题诉求就是这样‘访’出来的。”

郝智慧不是空手去跑，而是带着街道梳理的79个事项去了解走访对象，并将走访情况反馈到街道。街道组织每日点评、每周小结和每月考评，梳理各网格的治理难题，明确专人跟踪推进，并根据多项指标进行综合排名。这一干，就是整整11年。

2019年，仙林街道实施环境综合提升行动。南大和园社区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南京大学存在砖墙破损等6个环境问题，遂将问题反馈给校方，期望学校与社区共同协商加以解决。

当社区书记潘家燕迈进南大会议室时，吓了一大跳：学校房管处、学工处等多个处室负责人齐坐一排，等着她这位社区书记提要求。

“街道搞网格化机制、下沉式服务，我们这些驻区单位是受益者。”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坦言，学校大门口、地下通道、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周围群租房整治有效，菜场运营有方，教职工满意度大幅上升……

“沉下去，我们的辛苦指数多一些，但驻区单位的满意指数就高一点，居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就高一点。”200多名党员干部和网格员每日穿梭在街头巷尾，为群众的“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忙碌着。大小问题都能通过网格化服务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理。

也因此，仙林街道连续11年保持零上访，城市管理考核连续62个月蝉联全市第一，居民满意度98%以上。

## 全员参与共建共享，汇聚城市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多年来，以网格化机制为纽带，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在仙林街道驻区单位和广大居民中深入人心，形成了“仙林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2013年，仙林街道专门成立“一家亲”协会，南京大学、中建安装公司等56个驻区单位共同自愿出资650万元，用